

朱宗震 著

孤獨集

上海書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孤独集 / 朱宗震史学论文自选集 / 朱宗震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3
ISBN 7-80622-900-0

I. 孤... II. 朱... III. ①中国 - 近代史 - 研究 -
文集②中国 - 现代史 - 研究 - 文集 IV. K26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6550号

孤 独 集

朱宗震史学论文自选集

朱宗震 著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424号 邮编 200001)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7.75 字数406千

2001年3月第一版 2001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80622-900-0/K·187

定价: 38.00 元

序

史学界的朋友大多知道,范文澜同志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留下了一种可贵的学术传统: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前一句是指对历史科学那种执着的追求,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不为外界种种诱惑所动,不为流俗所左右。后一句是指在研究工作中始终脚踏实地,勤于蒐求探讨,坚持从可靠的原始资料出发,进行具体细致的剖析,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见解,不泛泛而论,不人云亦云,也不妄作缺乏事实依据的臆断。

朱宗震同志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近四十年。在他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可贵的学风。可能是因为他自己所说的生性“孤独”吧,很多人缺少对他足够的了解。这一次,他把自己多年来辛勤垦拓的成果结集出版,确实是一件很使人高兴的事情。

文集中所收文章的研究对象,大体上集中在两个时期:一个是民国初年,一个是抗战胜利以后。它们的共同特点,都处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时刻。20世纪的中国经历过三次历史性巨大变化: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改革开放。民国初年,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以前的那些日子,有如作者所说,可以看作辛亥革命的最后阶段;抗战胜利后那几年,又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夜,处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代表的两种社会力量进行决战的时刻。这种历史转折关头,事态百变,社会矛盾表现得比平时更加尖锐复杂,各种社会力量都在尽力选择自己认为的最佳对

1986

策,进行角逐和较量。从前一时期,我们可以看到曾经席卷全国的辛亥革命那样的风暴是怎样走向退潮的;从后一时期,我们又可以看到新的革命高潮是怎样形成并取得成功的。对这样的历史转折时刻进行综合考察,或对它的某些侧面进行具体分析,无疑是全面系统地研究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所需要的。

朱宗震同志多少年来正是锲而不舍地抓住这些问题,充分认识它的复杂性,下大力气,从浩如烟海的档案、当时报刊以及当事人回忆资料中细心梳理,从各个角度考察事变发展的方方面面表现,提出不少独到的、很有见地的论断。更值得重视的是,他对民国初年错综复杂的历史状况,特别是政治、军事状况十分熟悉,发掘出许多以往很少有人使用过的珍贵资料,对问题作过多年的反复思考,应该说,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是走在引人注目的前列的。

作者在本书中写道:“历史发展总是一个复杂的曲折的过程。”“事过境迁,后人很容易把当年复杂的斗争简单化。”他断言:“现代历史学要求历史工作者首先尊重客观事实,要求历史工作者运用尽可能的手段,对客观历史进行越来越详尽的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上再作出相应的判断。这是科学的态度。”从本书中可以看到,作者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努力的,这也是本书的特色所在。当然,既是对如此复杂的历史现象进行探索,书中的论断总有可以商榷之处。作者有时也在文末注明,自己的某些看法已有变化。但这种严肃而切实的工作,总是可以给读者以有益的启示。

我同作者相交四十年,既为他这部文集的出版感到高兴,也很乐于为本书写这篇短序,作为向读者的推荐。

金冲及

自序

历史学是一门人文学科,以人为本,而人是有感情和利益、有理想和期望的,人和人之间有着不同的道德和价值观念。然而人的思想又往往飘忽不定,因为所谓的“一念之差”而导致截然不同的后果,也是常见的事实。所以,偶然因素、情感因素对历史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样地,个人因素对历史也是一个巨大的变数。所以,历史学并不是纯粹的科学,因为它的人文性特点具有不可证明性。但历史事实是不可能更改的,事实的发掘和证明是历史学的基本内容。因此,史料学派认为现代史学是科学,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实证史学构成了现代史学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进一步证明了历史的发展存在着规律性,个人并没有力量去左右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他所生存、活动的舞台限制着他的活动范围。其实,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社会的活动同样是自然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有思想、有能量,每个有思想、有能量的人的随机行动,如水的分子一样,互相发生冲撞共鸣、分合离散,逐步形成有规律的运动,表现出它的自然性。英雄和领袖的思想,只有在和群众的思想发生共鸣(无论是正确还是错误)时才能发挥巨大的作用,而这种共鸣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生活条件下才能存在。因此,现代的分析史学为历史学增加了新的理性思维的科学性,能够予以证明的历史发展规律或趋势也是历史学科学性的组成部分。

历史非常难研究。史学家研究的是远离他自己生活经验的

人类活动,他要体验历史人物的感情世界,又不可能与前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这同作家和演员深入生活有着本质的区别(历史剧另当别论)。在大多数场合下,史学家主要是根据前人留下来的文字材料来研究历史,但这些文字材料又往往简单而零碎,史学家为了找到这些材料,并从这些芜杂的、没有直观感觉的材料中探寻历史的真相,进行严格的科学证明,就得耗去大量的时间,这同研究现实的人在工作效率上根本无法相比。然而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形成某种历史事实的因素非常复杂。一件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的发生总是复合因素造成的,而这些复合因素又是长期积累起来的,并且这种积累还是其他复合因素的结果。史学家作为个人要完全理解这一切,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只能相对而言,逐步深入地去理解历史,而且只能在他进行的专题研究的有限范围内才能有所成就。即使是最勤奋的史学家,他的历史知识也相当有限。

历史事件的发生有种种客观规律,有种种偶然因素,还有种种历史人物的个人品质和感情因素在内。这已经给史学家清理历史带来了巨大的困难。然而,史学家本身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们之间有感情和利益、理想和抱负、理智和个性、学养和天赋等种种区别。人的思维属于意识形态领域,每个人的思维都是外部因素很难控制的独立领域,史学家的工作主要是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这同社会生活的公共领域有很大的区别。因此,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不仅因为研究领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而且,主要是由于上述的不同而形成对历史的不同认识,史学家的党派性甚至会使得他们对历史形成截然相反的认识,由此衍生了史学作品的不同内涵和风格。史学作品也总是含有强烈的史学家个性,不同的史学家有着不同的历史观念,所以,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学家之间几乎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历史观。除了可以实证的领域之外,就历史观和对历史的认识而言,史学界永远

不可能达到一致,分歧和矛盾是永恒的。

我对历史学的爱好,在少年时期已经养成。在初中时,就把家藏的《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读得滚瓜烂熟,由此好奇地希望了解真实的历史,而不是小说故事。由于没有人指导,自己随意地看书。记不得什么原因,我从学校图书馆借阅了罗尔纲先生关于太平天国的著作,开始培养起对历史学的兴趣。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奇怪,一个小小的川沙县中学的图书馆,当时竟能购藏罗尔纲先生的考据学著作。严格点说,我从15岁初中毕业报考高中时起即已立志治史,至今已经四十四年了。但在高中时,受当时学术风气的影响,常常阅读论战性文章(例如关于中国社会分期问题的讨论)。结果,就发展起理性思辨的能力和兴趣,而对史学考据的兴趣反而减弱了。所以,在我的学术论文中单纯考据性的文字只有一篇,而且是翻译成日文发表的,没有中文本。那时《毛泽东选集》已出版三卷,我就开始阅读毛泽东的军事著作以及《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哲学著作,由此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我虽然体弱多病,没有从军当兵的可能,但毕竟是个男孩子,从阅读《三国演义》、《水浒传》到毛泽东的军事著作,培养起我对军事学的兴趣,这是近年来研究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远因。到大学读书时,我已对历史学具有广泛的兴趣。在大学的前三年,主要是读古代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到四年级分专业时,同学们以为我这个“老夫子”一定会选择古代史专业,但我却偏偏选择了近代史专业,由此毕业后到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研究所(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当班级里讨论毕业论文选题的现实意义时,我曾表示反对,认为历史学的任何题材都是需要研究的,没有必要去考虑现实意义,不同的题材自有其学科的意义。这个观点在“文革”的政治气氛中不得不动摇了,但我现在仍然对所谓的现实意义没有实际的兴趣,不过是敷衍当前流行的学术界的范式而已。

从1964年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四清”和“文革”的运动中生活,直到1973年后才开始正式的研究工作。但当时“文革”的影响还很深,所以直到1978年之后,研究工作才走上正常的轨道。这本论文集就是我1978年后研究成果的结集,属于我的一家之言,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我一直认为,自己的那些个性除了讲不清的遗传因素之外,主要是生活经历的产物。直到1993年后才感悟到,除了学养因素之外,我的孤独性格对自己历史观的形成竟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自从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我就不再关注社会是否对我的观点和研究产生共鸣,我相信自己研究的价值,在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中,统一、一致只有相对的意义,多样性才是绝对的。所以,我把自己的这本论文集取名为《孤独集》。

我6岁丧父,大哥在外工作,23岁起就承担了养育全家的重任。我长期在母亲和姐姐们的保护下生活,是形成我的孤独性格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另外一个因素更重要,就是4岁时摔伤了手,吃“野郎中”的烈药又伤了身体,从此体弱多病,削弱了合群的能力。少儿时期形成的性格对一生具有重大影响,尽管我从青年时期开始自觉地努力改变自己的性格,也确实有很大的进步,但事实证明并不能完全消除少儿时期的性格特征。在初中时,我的胆子很小,有点社交恐惧症,甚至害怕老师最普通的点名起立提问。大哥看到了我的弱点,就要我在初中毕业后报考寄宿制学校,过集体生活。正好,1956年夏初中毕业时,上海市户口开放了一下,大哥把我们全家从川沙县城(当时属于江苏省)迁到了上海市区,我也就有机会报考寄宿制的上海中学。

在上海中学读高中时,正值“整风”和“反右”运动,政治学习和讨论很多,人人都得进步。我不爱说话和孤独的性格使我在政治学习中受到了很大的压力,这样才努力学习开口说话。当时,正广泛阅读历史学中的论战文章和《毛泽东选集》,理性思辨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不但开始敢于在讨论会上说话,也开始敢于

论辩。虽然自认为在学习中发言已很积极,但也许老师对我原来的印象太深,评语仍然不太好。不过,我从此学会了论辩的能力,虽然不能口若悬河,但也思路明晰,条理清楚。“大跃进”时学校进行教学改革,作为学生,我还上台讲过历史课,虽然效果并不很好,但已经是一个质的突破。但是,在交际领域,学校的集体生活也没有能改变我的孤独性格,我是个埋头读书的好学生。在大学读书时,曾经担任过一段时间的读书小组长,但是不会做工作。有的学习小组长批评我不汇报组里的思想状况,事实上我从来就不懂为什么要汇报、汇报什么。受此批评后,也曾想努力改变这个状况,结果,与同组的同学发生了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和冲突。高考后我就有失眠的病症,这样一来就更厉害了,只好要求辞去这个微不足道的、对我来说是很沉重的“职务”。既然本来就不称职,批准辞职也是顺理成章的。自此,对自己的人生道路作了明确的定位:我这个人决不是当“官”的料,甘心当“兵”就是了。在“文革”中,军宣队、工宣队进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开始时封我当了一个小小组长(不是小组长,而是小组里的小组长)的职务,我深知自己的无能,于是,除了宣布开会宗旨之外,其余的事统统由小小副组长去应付了。当然,这个职务是不可能长久的。从此之后,这个“兵”就当了一辈子,至今还是白丁,连个委员、理事之类的名分都没有,只能支配书本和纸张。

当然,纯粹的书斋生活会严重影响对社会的观察能力,也会影响对历史的理解力。大学毕业后的两期“四清”,对我有着重要的影响。我必须独立地处理社会问题,这就养成了独立观察社会生活的习惯。“文革”的情况人所皆知,但“文革”的运动方式使大家大开了眼界,这是不争的事实,对扫除我们这些人的书生气也是很有效的。所以,我认为文科学生如能真正担任一段基层实际工作,而不是走过场,对他们了解社会实际生活确实很有帮助。“文革”后,我虽然一直从事研究工作,但仍然通过种种途径观察我们这个

社会。所以,我在社会活动上虽然仍然存在着浓重的书生气,但在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上却是相当仔细和广泛的。我的历史研究成果,包含了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认识和严重关切。

我的孤独的性格,对于同学术界的交流是个严重的障碍。为了克服这一弱点,自 1981 年起,努力争取参加一些学术会议,以便加强和学术界的联系。但是,神经衰弱的病症也成了一个障碍。我感到不习惯的交际活动使我很紧张和疲倦,所以很快就减少了活动,在学术会议上无非是认识几个人而已。不过,在学术讨论中却没有任何障碍,并且不太愿意发表重复的见解,力求提出令人深省的观点。因此,我在学术会议上的发言往往给与会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多少弥补了一些社交活动的缺失。当然,在这方面总是留下很多遗憾。1981 年参加武昌辛亥革命讨论会时,北京大学的陈庆华先生对我的论文十分赞赏,后来他对自己的学生也多次表扬我埋头苦干的精神。可是,我由于社交中的心理障碍,直到他去世,一次也没有去看望过这位史学界的长者,至今觉得十分遗憾。对于师友们的帮助,自己虽然铭记在心,但总是觉得不知如何答谢为好。而且,我的率直的性格,种种即兴发挥的批评,在有意无意间也不免伤人。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交活动能力的缺乏已严重影响到学术工作的进展。我收集了大量资料,于 1980 年写成初稿的《二次革命》一书,折腾 10 年才得以出版。我从 1981 年起,对《历史研究》的投稿,除一篇短文外,遭到了 10 年的退稿待遇,什么原因到现在也不知道,因为我投稿以后从不打听。从 1983 年起,甚至本所的《近代史研究》也退了我 6 年的稿子,直到不得已提出抗议,主编丁守和先生才特意予以关照,亲自挑选了一篇文章予以发表。这就是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的第二篇万字以上的长文章。至于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结果,因深知自己的弱点,所以也从不打听。我只是抗议这个结果,而不是针对某位编辑的。学术成果发表困难,对于一位学者来说当然是最烦恼的事情,有鉴于此,从

1990年起我才重新有所努力,虽然也取得了令熟悉我的朋友刮目相看的成绩,但为时已晚,无法弥补长期积累下来的缺失。

书生气和孤独的性格,当然会影响自己的行为方式以及对事物的观察方式,这就是独善其身、轻信和单纯理性的逻辑推理方式。在大学学习时,根据毛泽东教导,我从不崇拜权威,努力对事物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记得我当时参加了批判胡适的写作小组,同组的同学比较现实,因为学养不够,只好摘抄现成的批判文章,而我则刻意要提出自己的见解。结果,因为知识不够,大家都没有成功。有一次与同学讨论问题时,我认为,对毛泽东的观点,当然可以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进行讨论。在我看来,这是毛泽东自己提倡的探索真理的原则和创造性原则。为此,我受到同学善意的警告。因为,不是理论上而是事实上,当时毛泽东具有绝对的权威,不容任何人对毛泽东的指示有任何怀疑。我是个书生中的书生,不知道当时的政治行情。“文革”初起时,从内心对权威崇拜的现象和方式抱有反感,因为这本身不符合我所知道的毛泽东自己的主张。政治生活中理论和实践的背离,对我们这些书生来说,还面临着痛苦的思维矛盾的折磨。

我的书生气,勤于理性思考而懒于行动的孤独性格,使我在“文革”中免去了一场劫难。由于重视原则,忽视派系利益和帮派感情,对任何派系头头或领导都持批评的态度,虽然不对抗,但也不顺从,总有一种疏离感,有着自己的独立的判断。从不顺从的角度讲,我在“文革”中有一个不太流行的外号,就是“老造反派”,因为不管谁在台上,我都有所批评。虽然命运有很多偶然的因素,但这种生活态度在“文革”中并没有给我带来灾难。我是一个有独特见解的人,独来独往,没有坚定的派系立场,也就不是运动中的攻坚对象;我不是个软柿子,所以也不是运动中所要寻找的突破口。虽然我也是个嫌疑分子,但一时间也轮不上对我动真格,只有晾在一边。由于我的孤独性格,所以也没有死党来给我通风报信,免去

了提心吊胆的痛苦,等到知道自己曾经历的危险处境时,已经风平浪静了。而且,我在当时很受带班工人师傅和解放军优待。因为晚上失眠,每当开会时,常常上午一个瞌睡,下午一个瞌睡,瞌睡醒来则积极发言,竟然能够得到宽厚的师傅们的谅解,并且在全所人员(包括已经成家的和年长的学者)都集中居住的时候,享受到独居一室的权利。相比较而言,在我的一生中,“文革”中的生活比较令我满意,我在“文革”中既没有被整,也没有整人,因此也就不必受良心的谴责。但是,到了正常工作的年月,这种超然的、只有思想缺乏行动的孤独性格,在权利面前懒得伸手一争的行为方式,在无休止的各种无序的权利竞争中,我的合理、正当的利益常常受到伤害。这也是一种平衡吧,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我是个非常理性的人,理解发生的一切。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有一利必有一弊,不可能周全。既然不想也已不能改变自己的存在方式,我也就随遇而安,建立起自己的心理平衡。

近代史研究所开始正常工作后,我参加了民国史研究室的工作,重点是研究民国初年政治斗争到二次革命的历史,1986年后开始转入研究抗战胜利后的民国史。历史学当然有许多方法,但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方法论的建立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结果,这是事实。历史学是经验性的,一般说来,专业的史学家,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经济学家,更不是实业家,当然不是军事家,现代史学家甚至不是文学家,不深入研究文学和艺术的理论,但他常常需要去研究历史上发生的这一切。他只要懂得常理就可以胜任他的工作。专业史学家在方法论的创造上一般不居于重要地位,他们更多地借助于其他学科创造的研究方法,用于历史学领域。同时,一般的史学家也不需要运用复杂的方法,只要简单实用即能有所成就。我在历史研究中使用的基本方法来源于毛泽东的方法论。一是我记得毛泽东曾主张先做断代的研究,对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有了整体性认识,然后再做通史的研究。受此

启发,当我从事民国史研究的时候,就力图全面研究民国初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生活。只是近代历史研究的工作量太大,我们起步太晚,加上民国史研究任务的转移,未能完成计划,但仍对民国初年历史的各个方面有所了解,对一个时代有比较完整的认识。后来研究抗战胜利后的民国史,也是用这个方法,对国民党崩溃时期的中国社会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除了横向研究之外,我还通过几个人物的研究,从纵向上把整个民国历史贯串起来,以求能对这段时期的历史有一个比较全面深入的理解。一是比较研究的基本方法。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他在《矛盾论》中指出:“差异就是矛盾。”“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综合起来,运用于历史研究,就是要尊重历史事实,通过不断扩大比较研究的范围,发现差异和矛盾,寻找差异和矛盾的原因,进行理性的抽象和概括。所以,我在研究民初历史时,在能力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研究,对相关事物之间的差异进行解释。后来我把它称作“十字坐标法”。毛泽东的方法论并不复杂,简单实用,关键是要不断地去收集史料,了解史实,勤奋地思考。我因为长期患有失眠症,所以在资料的记忆上比较困难,但我的大脑却在不断地思考,把大量的细节放弃

了，留下了经过抽象的概括和结论。这样，知识面广泛和长于理性思维成为我的史学研究成果的特点。上面已经说过，我不崇拜权威，所以，总是力求根据历史事实，自己得出独立的结论。

在七、八十年代的工作中，从上述方法出发，我在比较研究开始摆脱传统的功过是非的历史评价模式，着重于理解历史，解释历史事件的发生条件和因果关系、各种思潮和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例如，对宋教仁的评价，传统观点从绝对肯定革命的立场出发，否定宋教仁争取民主制的努力，而近几年从肯定议会民主制度、“告别革命”的立场出发，又歌颂宋教仁的议会活动。其实两者都不符合实际的历史生活。我通过比较研究，发现革命党人的政治态度可以分成四种，他们的观点和活动与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之间都有很大的差距，我一一作了客观的分析。宋教仁的议会迷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但我主要是分析他的思维方式和政治思想水平，而不是要笼统地否定宋教仁。我开始注意到历史真实和传统观念之间存在着种种矛盾，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任何一种理论体系都无法和事实完全合拍。开始时，我在总体上还采用既有的理论体系，如资产阶级革命派等等，只是在研究的具体领域有所突破。慢慢地，对事实进行概括的范围扩大了，就完全从事实出发，自己进行理论概括。由于我的孤独性格，由于过分理性化和缺乏感情色彩，在考察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派系矛盾和思想路线冲突时，不自觉地摆脱了从某种利益和立场出发的价值判断，比较单纯地考察历史运动的客观过程，还常常用两种逻辑进行思考和辩驳，对自己所处的利益关系也看得很轻。我在同“左派”争论时是“右派”，在同“右派”争论时是“左派”，而在同“中派”争论时则既是“左派”又是“右派”，其实我没有派，但我知道各派的逻辑和他们的弱点。我逐渐认识到，所谓价值只是指一种事物在历史运动中存在的相对地位，而不是那种所谓功过是非、善良邪恶、是否合乎理性一类义理性的绝对价值判断。我在研究中发现，善和恶犹如

手心、手背一样往往是同时存在而难以分割的。

但是,在80年代的工作中,我仍然把重点倾向于解释成功者成功的原因,批评失败者,解释失败的原因。也就是说,把革命作为一条成功的道路来进行解释。尽管也观察到了成功者的负面,但按照“存在就是合理”的思维逻辑,来解释成功者成功的理由。例如,孙中山的革命存在许多问题,这是事实,当今社会上也出现了“告别革命”的思潮。但是,历史是不能忏悔的,历史是既成的事实,总有它成为事实的原因,没有合理性就不会成功。因而对于失败者,更多的是解释他们失败的原因,批评比较苛刻。但到1990年研究傅斯年的时候就有了一个转折。傅斯年是失败者,我在解释失败的原因时,就进一步解释失败者存在的合理性和他们的价值。这时才发现,世界是多元的,各有各的存在价值,“存在就是合理”同样适用于某些失败者。当然,当一个派系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它就是历史的淘汰者。存在有存在的理由,消亡有消亡的理由。这样,我就使用相对平衡的原则。存在的都有其合理性,同时有其不合理性,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东西。善事种恶因,恶行结善果,相反又相成,相生又相克。社会是在各种力量的相对制约的运动中发展的。同时,某个时代的个人在认识这个时代时犹如瞎子摸象,只能认识时代的一部分,综合起来才能构成对时代的完整认识。所以,我的历史观乃是四十而立(1980),五十而不惑(1990),比孔夫子的成熟规律晚了整整十年。

近代中国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向西方学习,革命和改良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从历史到现在争论不休。其实,通过世界范围的比较研究,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既有改良也有革命,国际战争其实也是一种革命性的形态,至于社会发展通过何种道路、由哪个党派来取得成功,是复杂的历史条件的组合,并无一定之规。近代中国无非是在寻找能够使中国的工业化起动的政治模式,也就是原始积累的模式。因此,各种社会改造活动都带有原始积累时期的落后性

和野蛮性。无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采取了什么理论模式,而实际的历史功效无非如此。排除了理论教条和价值判断模式来观察实际生活,我们就能科学地解释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

1993年时,我为此组织了一次小范围的讨论会,提出了“超越价值判断”的观点。但到会者几乎一致不赞成我的观点。基本道理也很简单,人生活在社会中,都有利益关系和不同的价值观念,史学家怎么能超越价值观念?会后我经过仔细的反省,终于大彻大悟了。确实,社会上的各个集团和党派都在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关系和价值观念,期望一般的人超越利益和价值去思考问题是不现实的,不同的历史学派之间就有种种分歧。但是,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是以尊重事实为基础的,而历史的真实总是不可能完全符合任何一个集团的利益和价值判断。由于一般史学家不参与实际政治行动,因而他们往往摇摆于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历史事实之间,并同行动中的政治活动家产生差异。而我因为生性孤独,不习惯合群的利益保护,不自觉地摆脱了从利益关系和价值判断去分析问题的常规,走上了全方位观察历史的道路。我在生活中当然不是没有是非观、善恶观,也有自己的道德操守和价值观念,但当我在观察历史和现实的社会运动时,我发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是非问题。善与恶的存在和运动也是一种生态的相对的平衡,恶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由于学者们过于看重自己选择的价值观念,即使是海外主张学术保持中立的学者也未必能真正做到价值中立。确实,绝对摆脱价值判断和利益关系也是做不到的,只有相对的意义。所谓中立性的历史学原则,和社会上的道德原则一样,道德只是社会生活的平衡器,任何一个人完全按照道德原则生活是做不到的,但严重偏离道德原则的行为就会遭到社会上的谴责和打击。道德家以道德自律为社会作出榜样,但政治家必须经权互用。苏代谓燕昭王曰:“仁义者自完之道也,非进取之术也。”(《战国策·燕策》)而像我这样生

性孤独而过分理性化的人,在社会上只能是极少数,不可能要求绝大多数人采取这样的思维方式。因此,这种过分理性化的思维方式是没有群众基础的,它可以比较全面地观察历史和社会生活,但不可能根据这种观察去制订行动方案。因为每一个行动方案都有利有弊,而我的理性分析因为失去了利益原则,也就失去了宣传的原则、鼓动的原则和党派的原则,在现实生活中就失去了制定行动方案的可行性。因此,我的分析方法也同样是不完美的。我只是一个历史和现实社会的观察者,而不是一个实践者。但是,现代社会是职业分工的社会,纯理论的观察对社会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学是以尊重历史真相为社会服务的,实证性是历史学的专业要求,因为除少数业余爱好者外,只有史学家在从事实证工作(具有实证性,也就是科学性的历史分析也包括在内),如果史学家放弃了实证工作,这就等于社会放弃了历史学的工作。因此,那些不认真从事实证工作的所谓史学家,严格地说不是史学家,而只是借历史学之名的某种社会活动家而已。因此,我的无立场的全方位分析法,是符合史学的学科要求的,可以比较客观地、科学地估价历史的实际运动,并以我的研究成果为社会服务。这种服务是全面的,大家都可以利用,而且它的成果具有继承的价值,而不是仅具时效性的宣传价值。历史学以科学的分析为社会服务,其实更有利于各社会集团和党派作出自己的选择。至于他们如何利用史学家的研究成果,那完全可以自由地作出不同的判断。事实上,各种利益集团和党派总是从自己的角度去利用历史学的成果的。正如现代的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理解《史记》,司马迁已经无法对后人的历史见解承担什么责任。史学家不应该期望左右社会的思维方式。永恒的是历史的真实,而不是历史的评价,历史的解读是永无止境的,也永远不可能达成一致。

当然,就整个社会来说,所需要的人才并不是单一的,多元的社会才是真实的丰富的活跃的社会。就史学家而言,也有着不同